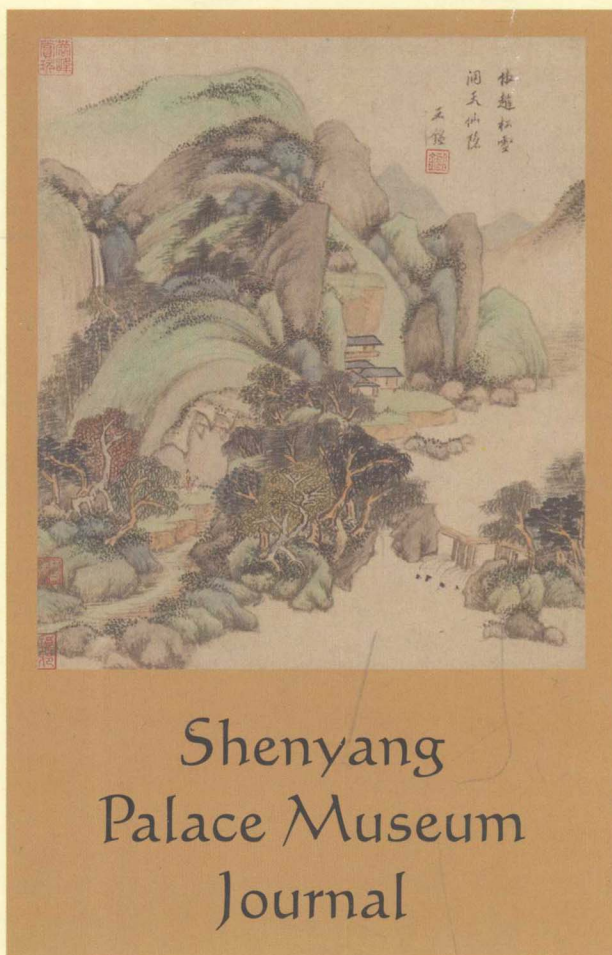




Shenyang
Palace Museum
Journal

沈阳故宫博物院院刊

— 2012 —

第十二辑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沈阳故宫博物院院刊

2012

第十二辑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沈阳故宫博物院. 2012 : 第12辑 / 白文煜主编. --
北京 : 现代出版社, 2013. 3
ISBN 978-7-5143-1476-2

I. ①沈… II. ①白… III. ①故宫博物院—沈阳市—
2012—丛刊 IV. ①G269. 263-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047378号

沈阳故宫博物院院刊

主 编 白文煜
责任编辑 刘宝明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010-64245264 (兼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信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 北京牛山世兴印刷厂
开 本 889×1194 1/16
印 张 11.75
版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1476-2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目 录

沈阳故宫博物院院刊 2012—12

盛京皇宫原藏文物辗转台北故宫略记·····	武 斌	001
清代盛京宫殿藏品及其著录·····	松茂如	008
参与乾隆帝书画鉴赏活动之臣工研究·····	刘 迪	020
末代皇后婉容御用簪花与佩饰研究·····	杨 洋	031
从沈阳故宫建筑看满族文化走向·····	罗也平	040
盛京城：大清帝国的理想城市空间 ·····	李声能	050
海城黄瓦窑《侯家宗谱》研究·····	李 刚	074
日晷、嘉量与乾隆时期沈阳故宫的第一次维修·····	孔 晗	082
李洪愿出宫回归辽阳当尼姑史事考述·····	刘肃勇	089
抗金黑军帅府提控孙氏墓志铭及墓碑·····	蔡 强 韩祥	097
论尚可喜的人生选择·····	徐雪梅	102
谢荫昌在奉时期的文化教育成就·····	王卓杰	112
辽东文人之冠 ——纪念金毓黻先生逝世 50 周年 ·····	初国卿	119
沈阳蒲河古事丛考·····	佟 悦	129
读“龙”札记·····	沈显惠	135
论“大故宫” ·····	武 斌	148
清代文化史研究概述·····	佟大群	158
沈阳故宫院藏书画的技术修复与保护·····	杨志强	168
沈阳故宫博物院所藏古籍中的满文书籍·····	李 梅	173

盛京皇宫原藏文物辗转 台北故宫略记

武斌

从北京到沈阳

1644 年是中国历史上急剧变革和极富有戏剧性的一年。在这一年里，起义军李自成的队伍轻而易举地打进北京，大明王朝的崇祯皇帝在煤山自缢，以身殉国；而李自成又很快地被多尔衮的队伍打出北京，大清王朝成为北京皇宫的新主人。因此之时，原来住在盛京（沈阳）皇宫的顺治皇帝和清朝廷全部迁到北京。盛京成为大清王朝的陪都，原来的皇宫则成为陪都宫殿和皇帝东巡的行宫。

盛京皇宫并没有因为主人们迁到了北京而被废弃。作为清朝的“开国圣迹”，盛京皇宫受到特殊的重视和保护。自康熙十年至道光九年（1671—1829 年）间，康熙、乾隆、嘉庆、道光四代皇帝先后共十次东巡，祭奠位于辽宁新宾的永陵和沈阳的福陵、昭陵，其间都曾入盛京故宫驻蹕并举行相关典礼。这座宫殿重新具备了供皇帝使用的价值，促进了盛京皇宫的保护和修缮。特别是在乾隆年间，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改修和增建，增建了分别用作皇帝和皇太后行宫的东、西所，以及飞龙、翔凤、敬典、崇谟等收藏宫内物品的楼阁，增建了盛京太庙、收藏《四库全书》的文溯阁、戏台等建筑。现在看到的沈阳故宫面貌，正是在乾隆时期完善的。也正因为如此，沈阳故宫才更显得富丽堂皇，威严大气，巍峨壮观，气宇轩昂。

沈阳故宫不仅是著名的古代皇家建筑群，也是一座有着丰富藏品的宫廷艺术品博物馆。在大清王朝的康乾盛世，中国古代各类艺术都呈现了繁荣发展的局面。清朝的帝王，如康熙、雍正、乾隆等，都有很高的艺术造诣，对艺术发展有浓厚的兴趣，所以，这个时代的宫廷艺术也出现了大繁荣的局面。清朝宫廷艺术品的收藏量极大，分别存放在北京故宫、承德避暑山庄和沈阳故宫等处。沈阳故宫因此号称是清宫艺术品的“第三大宝库”。

据有关史料记载,在清帝东巡盛京期间,京师内务府为保证帝后在盛京举行各项礼仪及日常膳食、起居等生活需要,曾奉旨向盛京宫内输运了大批帝后御用器物,充实和丰富了盛京皇宫各个宫殿的陈设与御用物品。依据现有的清朝档案材料及存世实物看,清帝东巡为盛京皇宫带来的帝后御用物品主要有:皇帝、后妃御用卤簿仪仗,宫廷乐器,宫中祭祀用具,宫内陈设、家具、餐具、文房用品和帝后、妃嫔等人的服饰、佩饰等等。据档案记载,康熙时期已将东七间楼作为专门存贮盛京典礼所用銮驾卤簿的库房,称之为“銮驾音乐楼”。沈阳故宫博物院现藏文物中,至今尚有原藏于此的康熙时期杖鼓、编钟等类宫廷乐器。

康熙朝时,曾数次向盛京皇宫送贮前朝及当朝皇帝御用弓矢、甲胄、鞍辔、刀枪等物。康熙帝初次至盛京谒陵期间,将原存北京的其父顺治皇帝生前所用部分武备如兵器、鞍具等移至盛京,于旧宫内“供奉”。按现存清代道光、光绪朝《飞龙阁恭贮各项器物清册》记载,康熙十年,有“世祖章皇帝御用嵌松石珊瑚丝线鞦辔绣龙革占镀金龙头铁镫鞍”等顺治帝御用马鞍18副、“世祖章皇帝御用黑面桦皮弓”等弓4张及御用箭176枝,“恭贮”于盛京皇宫。此后康熙二十一年、三十七年仍有增加,乾隆、嘉庆、道光历次皇帝东巡谒陵时相沿成制,也都由北京运送前代皇帝所用武备至开国宫殿收藏。咸丰以后即使皇帝未再出关谒陵,但直到清末仍按制而行。档册记载,宣统元年八月二十五日,“恭贮”光绪皇帝御用金桃皮弓一张、花皮弓一张及花箭等共十枝,入藏盛京皇宫飞龙阁。因此,沈阳故宫博物院所藏清帝御用武备形成从太宗朝至德宗朝比较完备的系列,成为渊源最久的一项特殊藏品。

到乾隆朝,由于清帝国历经一百余年的发展和积累,宫廷中汇聚了普天之下众多奇珍异宝,这其中既有历朝制作和流传的精美书画、瓷器、雕刻品等艺术品,同时也有康、雍、乾“三朝盛世”期间制造生产的瓷器、玉器、珐琅器、织绣品、雕刻品和书画艺术品等宫廷宝物。这些不可胜数的宫中珍宝除少量实用外,绝大多数是为了宫中陈设及为收藏所造。乾隆皇帝出于对祖先宫殿的敬重,特谕在盛京皇宫收藏、供奉多项宫廷文物。一些新增建筑如文溯阁、敬典阁、崇谟阁等,兴建时即为供储物之用。以后的嘉、道时期,这种调运宝物之举一直延续下来。清朝各代向盛京皇宫输送的奇珍异宝种类繁多,数量巨大,如仅在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一次就向盛京宫内拨运康熙、雍正、乾隆年款各色瓷器十万件。清宫所藏为历代之菁华,直至今日所见,就其质地、工艺、题材均属上乘。这些珍贵文物瑰宝琳琅,华光焕彩,显现着皇权至上和皇家豪富,是有清一代富足的历史物证。乾隆时期还开始移送的一些专项藏品,如清列帝《实录》、《圣训》、《玉牒》、谥宝谥册、殿版书籍等,属于历朝按制递修、具有延续性的国史秘档或典制文物。乾隆皇帝在确定其于盛京尊藏一份的同时,即传旨修改了原有的相关收藏供奉制度,不仅将已经修成者送贮,而且此后每次续修新制,都要依例续送一份至盛京皇宫,以保持其延续性和完整

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乾隆朝时，举全国之力，编撰了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四库全书》。当时，《四库全书》共抄写七套，其中有一套就藏在盛京皇宫。这是目前所存《四库全书》三套半中完整的一套。当时，清朝政府从内库拨银七万两，在沈阳故宫西侧仿宁波天一阁设计营造了举世闻名的皇家图书馆“文溯阁”，贮藏《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还有《四库全书》的总目、考证、简明目录、分架图等辅助类书籍。其中《四库全书》计六千一百四十四函，三万六千多册，《古今图书集成》计一万卷五百七十六函、五千余册。

据沈阳故宫博物院学者佟悦先生研究统计，至清朝末年，盛京宫殿内陈设和收贮的宫廷文物、图书、档案等共20余万件册之多。其中既包括供各宫殿陈设和供皇帝后妃驻蹕使用和赏赐的物品，也有作为国史旧籍、先帝遗物、御赏古董、内府珍籍等收储的宫廷秘藏。除清帝每年常住的北京宫殿、京西御园、避暑山庄外，其他地方所藏清宫文物无论在种类和数量上都无法与之相比。

从沈阳到北京

清末，国运衰微，盛京皇宫所藏珍宝多有散佚。日俄战争期间，俄国军队在盛京皇宫驻扎，盗走许多珍贵文物。俄军撤出盛京皇宫后，盛京将军增祺等人对宫内藏品进行查验，有万余件藏品被盗丢失，大部分为金锭、金条、瓷器、书籍、墨刻等。此外，还有一些珍宝以赠送的名义外流。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唐绍仪以专使身份出访美国，行前至盛京，奉慈禧太后旨意，取走奉天皇宫数件瓷器作为赠品。宣统元年（1909年），曾任驻埃及将军的英国人希吉纳来北京访问，向监国摄政王载沣提出到盛京皇宫游览并索要藏瓷，竟适其贪欲，可自选两件，为朝廷赠送给他的礼物。时任奉天旗务总办、兼管盛京内务府事务金梁慨叹说：“盛京皇宫藏珍虽富，又能禁几人予取予携耶？”

清民易代后，按照优待条例，盛京皇宫及其原藏文物仍属逊帝小朝廷所有。民国元年（1912年），民国政府教育部议于北京设立历史博物馆，并成立筹备处，欲以盛京皇宫文物运京供其收藏及展览之用，并派戴克让、许丹、齐宗颐三人至沈阳“调查”，历时一个月，将盛京故宫所藏书画、瓷器及其他清宫器物全部验看一过，并抄录文物清册20本带回北京。但因“当时国是甫定，部务繁多，重以兹事体大迁延不决”，以致此事半途而废。1912年10月1日，《内务部为筹设古物保存所致大总统呈》又提出：“查古物应归博物馆保存，以符名实。但博物馆尚未成立以先，所有古物，任其堆置，不免有散失之虞。拟请照司所拟，于京师设立古物保存所一处，另拟详章，派员经理。至各省设立分所之处，应从缓议。”

1913年（民国二年）9月，民国政府内务部金事、著名画家金城建议：“仿效法国罗

浮宫的先例，将承德避暑山庄和沈阳故宫遗留文物运到内务部管理的紫禁城前朝，建立收藏、展示皇家艺术品的古物陈列所。”据此，内务部呈请大总统袁世凯批准，决定于北京故宫“外朝”（乾清门以南，以三大殿为主）建立“内务部古物陈列所”。1913年12月24日制定的《古物陈列所章程十七条》申明：“本部有鉴于兹，默察国民崇古之心理，搜集累世尊秘之宝藏于都市之中，辟古物陈列所一区，以为博物院之先导，综我国之古物与出品二者而次第集之，用备观览，或亦网罗散失参稽物类之旨所不废欤。”1913年12月30日，古物陈列所筹备处正式迁入武英殿西配殿北二间办公，1914年2月4日，古物陈列所正式建立。

因当时故宫内廷建筑群及文物尚归逊清皇室管理，因此内务部决定从热河行宫（承德避暑山庄）和沈阳故宫调运文物以供收藏展览之用。1914年1月，内务部派冶格（原镶红旗蒙古都统兼清宫护卫军都护史）和沈国钧赴沈阳，办理盛京皇宫陈设物品起运事宜。通行者包括随员十余位和清室内务府福子昆等。此外，还带了北京奇宝斋古玩铺十余名工人前往，负责包装古物。他们在奉天都督张锡銓的协助下，从1月13日至3月24日，分六次1201箱、114600余件册铜器、瓷器、书画、书籍、珠宝、文房用品等，运到北京。所运文物，主要是原藏于飞龙阁的御用武备和古代铜器、翔凤阁内的各宫殿陈设物品、东七间楼明清陶瓷，以及行宫宫殿内的家具陈设等项物品，均属盛京皇宫所藏文物的精品。次年，沈阳故宫文溯阁《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也全部运京，陈放于保和殿，归属古物陈列所。运到北京的热河行宫的文物计1949箱、117700件，同样数量巨大。不过，当时就有人认为，热河行宫藏品“不能如沈阳行宫之富丽与精美”。运到北京的盛京皇宫和热河行宫的这些文物“均经分别品类，登记册簿”。然如此数量巨大，“仅编总册，未能精详”。直到1925年，方制作完成《古物汇总目录》。

带有花絮性质的是，从承德和沈阳运到北京的文物数量巨大，工程浩繁，但是，由于“优待条例”的原因，民国政府当时认为“清室宝物仍归小朝廷所有”，古物陈列所的文物，“就当作为清室借给民国政府陈列，到民国政府财政好转时，才支付全部价钱”。经民国政府与逊清皇室双方“约同古玩商家逐件审定，折中估价”，两地运京文物共值3511476元，“当未付价之前，这些古物暂作皇室出借民国之用”。末代皇帝溥仪的英籍老师庄士敦在其回忆录《紫禁城的黄昏》中，也提到古物陈列所展览的文物“借用”的性质。

沈阳和承德的文物相继运达北京后，“分置太和、中和、保和、文华、武英各殿”。后又将昭德门与体仁阁及左右配房，以及太和殿两掖间，一并改为盛京文物库房。1914年6月，用美国退还庚款20万元在武英殿以西的咸安宫旧基，建筑宝蕴楼库房，用来保存文物。宝蕴楼被称为“中国近代博物馆史上第一座专门用于保存藏品的大型现代文物库房”。

1914年10月10日，古物陈列所在武英殿正式开幕，并自次日起售票，供各界人士

参观。到月底的20天内，参观人数达到11000余人次，鲁迅、顾颉刚等知名人士都曾前去参观。另据统计，从1928年7月中旬到1934年，6年间共接待观众422000人次。在中国的博物馆历史上，古物陈列所的创立意义重大。故宫老院长马衡先生说，古物陈列所“始具博物馆之雏形”，开创了国立博物馆之先河。

然对于沈阳故宫来说，在其所藏文物迁运北京、入藏古物陈列所之后，基本上是物去楼空，原藏文物所剩无几，使这座古老宫殿的光辉黯然失色。这些迁入古物陈列所的文物一去不复返，再也没有机会回到沈阳故宫了。1930年10月，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提出《完整故宫保管计划》，并经行政院通过。其中提出：古物陈列所“即由内务部、故宫博物院、沈阳故宫博物分院会同派人接收，组织点验会”，嗣“将沈阳移来之一部分仍移归沈阳故宫博物分院，以完沈阳历史上之古迹”。然而，由于时局动荡，这个计划终没有实现。

不过，也有一个例外，就是1925年《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复回盛京。当时，奉天省教育会会长冯广民等人赴北平参加“清室善后会议”。他们在参观古物陈列所时，见到部分陈列于保和殿的文溯阁《四库全书》。冯广民等人先赴天津求助于张学良、杨宇霆，又回北平求得支持。1925年7月，段祺瑞临时执政府国务会议议决，令古物陈列所将文溯阁《四库全书》运回沈阳，贮置于原阁。是年8月，冯广民等邀集旅京的奉天省人士30余人，用8天时间将全书检收包装，于8月7日将36000余册《四库全书》和5000余册《古今图书集成》全部运回沈阳，暂存于省教育会所属文庙内。翌年省政府拨款对文溯阁加以整修。1927年年初，文溯阁《四库全书》得以“书阁合一”。1931年6月，镌刻《文溯阁四库全书运复记》石碑于文溯阁外东壁，以志其事。不过，现在这套《四库全书》并没有贮藏在沈阳故宫。1966年，出于备战的考虑，这套完整的《四库全书》被移送到甘肃省图书馆保存，也是一去不复返。所以，我们现在只能看到文溯阁依然屹立，而文溯阁里面只有空空如也的藏书架了。这是沈阳故宫的一大遗憾。但，这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从北京到台北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华北局势岌岌可危，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决定把文物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所以就有了文物南迁的壮举。1933年2月5日夜，故宫博物院的第一批南运文物2118箱从神武门广场起运，3月初运抵上海。1933年2月7日，古物陈列所也接到内务部的密令，要求“选取文物精品，装箱南运”。故宫博物院派出工作人员前往古物陈列所，帮助选取文物和装箱。行政院与内务部派出数名监运专员进驻古物陈列所，昼夜督导装箱起运。自3月中随故宫博物院第二批南迁文物同时启运开始，古物陈列所先后运出四批，共5415箱，计111549件，其中：瓷器93707件，铜器1729件，

玉器 786 件，铜珪琅 2817 件，字画 493 件，珍物 94 件，文玩 1687 件，书籍 6415 件，刺绣 75 件，钟表 59 件，雕漆 123 件，盆景 131 件，挂屏 204 件，铜镀 749 件，铺垫 661 件，紫檀小床 1 件，藏经 1319 件，戏衣 345 件，宝座 1 件，弓 128 件，刀 20 件，象牙 5 件。留在北京的还有 88202 件。

古物陈列所的这批南迁文物运到上海后，与故宫博物院南迁的文物一起，在法租界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的故宫博物院驻沪办事处存放。1936 年 8 月，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朝天宫库房建成后，古物陈列所的南迁文物也分两批从上海移到南京，存入新库房。淞沪抗战爆发后，古物陈列所南迁文物随故宫博物院文物分三路同时迁出南京，辗转运到四川，直到抗战胜利。1946 年，南迁文物回迁，散储于四川乐山、峨嵋、巴县库房文物包装箱，从 1946 年 1 月起运，先集中于重庆，于 1947 年运回南京。

1948 年 3 月，古物陈列所与故宫博物院正式合并，古物陈列所留在北京的那 80000 多件文物划归了故宫博物院，南迁的文物则移交给南京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从此，原藏盛京皇宫、后归古物陈列所、而后南迁的那一部分文物就划到了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名下了。

国民党撤台之前，1948 年 11 月，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任故宫博物院理事长的翁文灏邀集故宫博物院常务理事等，商定选择故宫精品运往台湾。12 月，故宫博物院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理事会会议，决定文物分三批运台。自当月起至第二年 2 月，存放于南京的原古物陈列所现属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文物，分装 852 箱，其中有铜器、瓷器、珪琅、雕漆、字画等，分三批运往台湾。未及迁运的文物，日后俱成为南京博物院的藏品。

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文物和故宫博物院的南迁文物一起，到了台湾以后，又有了一个漫长的辗转保存的过程。直到 1965 年“台北故宫博物院”双溪新馆址建成，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与“台北故宫博物院”正式合并，这些文物终于有了最后的落脚之地。不过，那些原藏于沈阳故宫的文物现在则隶属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名下，并且是其重要的藏品了。“台北故宫博物院”学者宋兆霖先生指出：“现台北故宫的名品，例如西周的献侯鼎、颂壶、南宋夏珪的溪山清远图卷以及南薰殿历代帝王、帝后肖像等，都是当年古物陈列所的藏品。”1989 年，“台北故宫博物院”清点文物，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 852 箱，总计 11562 件，都保存完好。这其中器物有 11047 件，书画 477 件，图书文献 38 件。有几项类别的文物，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全部藏品中所占比例比较高。如铜器 2715 件，占“台北故宫博物院”院藏总量的 45.28%；瓷器 5561 件，占院藏总量的 22.97%；文具 418 件，占院藏总量的 17.57%；漆器 133 件，占院藏总量的 18.81%；珪琅 1476 件，占院藏总量的 58.80%；丝绣 21 件，占院藏总量的 10.13%。

那么，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盛京皇宫原藏文物，即人们所说的“奉字款”文物，到底有多少呢？2010 年，沈阳故宫博物院学者周维新先生曾两次专程赴“台北故宫

博物院”进行调查，此项调查得到了“台北故宫博物院”院方与相关专家的大力支持和积极配合。周维新先生根据相关资料记载及“台北故宫博物院”方面提供的资料了解到，目前存于“台北故宫”的沈阳故宫原藏书画、瓷器、青铜器、珐琅器四大项有近两千件。其中历代书画总计 106 件，瓷器 738 件，铜器 140 件，珐琅器 74 件。^①

这些藏品均曾藏于盛京皇宫，后几经辗转流传入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但目前的这个统计还不能说是完整的。

最近两年，我多次有机会去台湾参访交流，并与“台北故宫博物院”进行业务方面和学术方面的合作，而每次到“台北故宫博物院”，我都尽量安排时间参观它的展品，因此也就有机会接触观摩上述原藏沈阳故宫文物之一二。在惊叹其精美绝伦和价值高超的同时，心中也涌现出无限的感慨。这些负载着重大历史文化价值的文物精品，其命运多舛，辗转流传，正是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和国势国运风云变化的一个缩影。

（作者单位：沈阳故宫博物院）

① 藏品名称详见《盛京皇宫藏品于民国时期的移迤》一文，载于《沈阳故宫博物院院刊》第十一辑，2011 年。

清代盛京宫殿藏品及其著录

松茂如

清代盛京宫殿（或称奉天行宫、沈阳故宫），是清王朝肇基关外时期的皇宫。因其从康熙时起，又成为皇帝东巡谒祭祖陵时驻蹕之处，且于乾隆年间增建一些行宫建筑，于原有“国初旧迹”之外，又增加了供后世皇帝谒陵使用的新功能，成为兼有清入关前后两重意义的宫殿建筑群，因此也与北京紫禁城宫殿、圆明园、热河（承德）避暑山庄并存的皇家文物集聚之处。至清朝末年，这座宫殿内陈设和收贮的宫廷文物、图书、档案等共 20 余万件（册）之多。其中既包括供各宫殿陈设和供皇帝后妃驻蹕使用和赏赐的物品，也有作为国史旧籍、先帝遗物、御赏古董、内府珍籍等收储的宫廷秘藏，遂使这处位于山海关外大清龙兴之地、规模并不宏大的故宫，成为当时闻名中外的清代皇家文物宝库之一。

盛京清宫藏品的聚散

从 1625 年清太祖定都沈阳至 1644 年顺治入关，盛京皇宫作为后金（清）地方政权宫殿共使用近 20 年。清迁都北京后，所有原在盛京皇宫内居住的皇帝、后妃都移居北京，故此处宫殿内并无必要遗留具有使用价值的御用物品。由于此后直至康熙帝初次回盛京谒陵前，并无人在宫内居住，仅是对旧有建筑进行必要修缮和维护，除少量先朝遗物（如清太祖、太宗时期印牌、信牌等）以及管理修缮宫殿者应用的器具、材料等外，并无重要物品在其内收藏。

康熙十年至三十七年（1671—1698）间，清圣祖玄烨三次回盛京祭祀祖陵，入故宫瞻仰旧迹、凭吊先皇，或演武较射，宴赏群臣。其中第二次东巡（1682 年）且居于崇政殿前清初内三院值房。皇帝至此举行典礼活动，必有典礼所用卤簿仪仗、乐器以及筵宴所用桌张餐具、赏赐物品等相应物品。由于皇帝谒祭祖陵并非偶尔举行，而是历朝都须遵行的定例，因此一些供其在盛京宫殿使用之物便自此时起经常性地存放这里，使这座“先皇旧

宫”重新成为当时皇帝御用物品的存放之处。根据档案记载，康熙时期已将东七间楼作为专门存贮盛京典礼所用銮驾卤簿的库房，称之为“銮驾音乐楼”；沈阳故宫馆藏文物中，至今尚有原藏于此的康熙时期杖鼓、编钟等类宫廷乐器。

另一项与藏品有关之事，是康熙帝初次至盛京谒陵期间，将原存北京的其父福临（清世祖）生前所用部分武备（兵器、鞍具等）移至盛京，于旧宫内“供奉”。此事与满族旧俗相关，即人故去后的遗物，除用作焚祭者外，由其后世子孙保存以为“遗念”。由于其民族尚武传统，这类遗物中与骑射有关者更受到特殊重视。按照现存清代档册记载，康熙十年，有“世祖章皇帝御用嵌松石珊瑚丝线鞦辔绣龙革占镀金龙头铁镫鞍”等顺治帝御用马鞍18副、“世祖章皇帝御用黑面桦皮弓”等弓4张及御用箭176枝，因玄烨东巡祭祖而“恭贮”于盛京故宫。此后康熙二十一年、三十七年仍有增加，乾隆、嘉庆、道光历次皇帝东巡谒陵时相沿成制，也都由北京运送前代皇帝所用武备至开国宫殿收藏^①。咸丰以后即使皇帝未再出关谒陵，仍按此制而行。档册中记载，宣统元年八月二十五日，恭贮德宗景皇帝（即光绪帝）御用金桃皮弓一张、花皮弓一张及花箭等共十枝，入藏盛京故宫飞龙阁^②，因而使这里所藏清帝御用武备形成从太宗朝至德宗朝比较完备的系列，成为渊源最久的一项特殊藏品。

乾隆朝，皇帝共四次东巡谒陵，盛京故宫藏品规模大备，数量骤增。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此时东巡谒陵已制度化，其间盛京宫殿内驻蹕、庆贺、筵宴、赏赐、祭祀等活动，已载入国家典制，因此需要大量宫廷物品在此贮存备用。如銮驾库所存清代编钟、编磬、鼓、角、琴、瑟等宫廷乐器（见彩版2），以及数以百计的皇帝卤簿仪物，初时是皇帝东巡时由北京带来，供盛京举行相关典礼时所用，后因往来携带不便，即留沈阳，并陆续调整补充，成为专藏。再如翔凤阁（见彩版1）所存金银、衣料等，多是供皇帝赏赐臣下所用。

二是乾隆皇帝出于对祖先宫殿的敬重，特谕在此收藏、供奉了多项宫廷文物。其中一些与盛京城作为开国之都的历史地位相关，如清历朝《实录》、《圣训》、《满文老档》、《玉牒》、清初印玺、帝后画像、玉宝玉册（见彩版2）、殿版图书、《四库全书》等；另一些则由于某种特殊原因转存于此。如飞龙阁的八百件古铜器、东七间楼的十万件明清官窑瓷器等，本与沈阳城无关，因调整北京宫苑库存品种而运往沈阳。

三是乾隆年间在盛京旧宫区域内增设行宫建筑，其供皇帝后妃居住的东、西所中的家具和陈设品，数量颇多，即使皇帝未驾临时也常备存贮于此。另有一些典籍、书画等也长

① 见辽宁省档案馆藏清道光《飞龙阁存贮器物清册》。

② 见辽宁省图书馆藏《盛京清宫宝器册》。

期存放于此，以备皇帝驻蹕使用之需。一些新增行宫建筑如文溯阁、敬典阁、崇谟阁等，兴建时即为供储物之用。此外，如各宫殿中宝座屏风、椅柜几案、匾额楹联及门神对联等，属于建筑附属物，总数也达数百件，自然常年于此存放，成为藏品组成部分之一。

更为重要的是，乾隆时期开始移送的一些专项藏品，如清列帝《实录》、《圣训》、《玉牒》、谥宝谥册、殿版书籍等，属于历朝按制递修、具有延续性的国史秘档或典制文物。皇帝在确定其于盛京尊藏一份的同时，即传旨修改了原有的相关收藏供奉制度，不仅将已经修成者送贮，而且此后每次续修新制，都要依例续送一份至盛京宫殿以保持其延续性和完整性，使之可以随着王朝的发展递增。因此，这些专项藏品在嘉庆以后依然按制续送，内容一直延续至同治朝（光绪朝送至）。

由此中见，乾隆时期入储文物是盛京清宫藏品的绝大多数。至乾隆五十年（1785）《四库全书》全部送齐后，其总数已达20万件（册）以上，除清帝每年常住的北京宫殿、京西御园、避暑山庄外，其他地方所藏清宫文物无论在种类和数量上都无法与之相比。

清朝后期，位于东北地区的盛京皇宫及其藏品也受到列强入侵的威胁，光绪二十一年（1895）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日军从辽南登陆向奉天腹地进攻之际，盛京官员已开始为转移重要文物作相应准备，后因停战并未真正实施。1900年，沙俄军队借口保护铁路和教民出兵进入东北镇压义和团。盛京将军增祺等根据事先请旨拟定的方案，将太庙（见彩版1）所藏玉宝玉册送入略为安全的敬典阁中保管，而当时视为最重要藏品的凤凰楼内清历朝皇帝画像及清初御玺，则于俄军占领沈阳前一天（9月30日）由官兵护送运往热河（即承德避暑山庄），而且由于此后战乱不息，再未运回，成为盛京皇宫流失的第一批藏品。

更为严重的是，沙俄军队侵占沈阳后，盘踞三年之久迟迟不肯撤兵。在此期间，盛京皇宫区域在其控制之下，内藏文物损失严重。据俄军撤离后盛京内务府官员点查，丢失损坏物品数量惊人。其中翔凤阁缺失以金银制品为主的各种器物三千余件，其中仅金器、金锭、金条制品合计重量即达万两以上；东七间楼缺损各种瓷器（以康雍乾三朝官窑器为主）六千三百多件；西七间楼缺失各种清代内务刻印书籍墨刻五百四十余件。此外，飞龙阁所藏御用武备、古铜器，西七间楼所藏宫廷乐器，以及崇谟阁、敬典阁、文溯阁、太庙所藏《实录》、《圣训》、《玉牒》、《四库全书》、玉宝玉册等也都有少量缺失。

此次藏品丢失损坏的主要原因，是在俄军占领期间盛京宫殿管理失控的情形下，因俄军借机偷窃、中方相关管理人员监守自盗、不法之徒借机盗窃等多方面因素造成。其所丢失物品，除后来在国内外曾少量发现，大多数下落不明，成为盛京皇宫藏品最惨重的损失。

清代末年，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位于东北地区的陪都宫殿已经失去往日尊严，这里收藏的宫廷文物也有部分流失。根据档案及当事者记载，清末民初，曾数次奉摄政王

载沣或逊帝溥仪旨意，以盛京宫殿藏品作礼品赠送外国人，在相关文物档册和金梁《光宣小纪》等著述中都有具体记载。为避免盛京文物继续外流，当时一些有识之士还曾上书朝廷，请求在此设立皇室博物馆，既可有效保存文物，又便于中外人士观览，可惜未获批准。

清民易代后，沈阳清宫文物收藏开始解体。民国元年，民国政府教育部议于北京设立历史博物馆，并成立筹备处，即欲以盛京清宫文物运京供其收藏及展览之用，并派戴克让、许丹、齐宗颐三人至沈阳调查，历时一月，将盛京故宫所藏书画、瓷器及其他清宫器物全部验看一过，并抄录文物清册 20 本带回北京，但因“当时国是甫定，部务繁多，重以兹事体大迁延不决”^①，以致此事半途而废。民国三年经北洋政府内务部呈请大总统袁世凯批准，决定于北京故宫外朝部分设立博物馆性质的“古物陈列所”。因当时故宫内廷建筑群及文物尚归逊清皇室管理，因此决定从热河行宫和奉天故宫调运文物以供收藏展览之用。本年三月起，沈阳故宫藏品共 115199 件运往北京，连同承德运往者共 20 余万件，收贮于紫禁城西华门内宝蕴楼等处。十月，从中选择部分文物于文华殿、武英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等处公开展出。本次所运沈阳故宫文物，主要是原藏于飞龙阁的御用武备和古代铜器、翔凤阁内的各宫殿陈设物品、东七间楼明清瓷器，以及行宫宫殿内家具陈设等项，均属盛京宫殿所藏清宫文物精品。次年，沈阳故宫文溯阁《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也全部运京，陈放于保和殿，归属古物陈列所。上述文物仅文溯阁《四库全书》等书籍，于 1927 年运回沈阳，余者大部分在抗战前夕随“古物南迁”辗转运至四川，抗战胜利后回运至南京后，一部分被运往台湾，一部分运回北京，另有一部分仍存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分归南京博物院和江苏省一些地、市博物馆。

尚存沈阳的原盛京清宫藏品归属权也发生一些变化。1926 年东三省博物馆成立后，原存清代乐器及卤簿仪仗，太庙所藏玉宝玉册等先后归博物馆（即今沈阳故宫博物院前身）收藏展览，而崇谟阁、敬典阁所藏《实录》、《圣训》、《满文老档》，文溯阁《四库全书》和西七间楼所藏殿版书籍，均归属 1938 年成立的伪满“国立奉天图书馆”（今辽宁省图书馆、辽宁省档案馆前身），至今仍在沈阳地区的上述单位收藏。

盛京清宫藏品存放处所及种类、数量

清乾隆以后，外界很多人知道盛京的皇宫储存着为数不少的皇家珍宝，但对其具体种类和数量几乎无人能描述清楚。因这些物品是在一百多年中分多次或成批或零散由北京运

^① 见《国立历史博物馆馆刊》第一年第一册（1926 年出版）。

来,即使负责管理的内务府官员,也难以全部了解详细内容。何况其存放地点属宫阙禁地,无关人员不得靠近,更无从得知细节详情;而有条件接触到这些藏品的人,又碍于宫规不得向外界透露。清代的一些官私记载虽曾有涉及,但都笼统含混,简单零散,且多是得自传闻转述而非出于亲见。直至近数十年,研究者根据清宫档案记载,对照宫廷建筑和现存实物综合分析,对清盛京宫殿藏品情况方有较为清晰了解,以下按照其收贮地点(库房)简要介绍如下。

1. 飞龙阁

位于中路崇政殿前东侧,为面宽五间的二层楼房。复建于乾隆十三年(1748)。阁内上层为存放清历代皇帝御用武备之处,各种弓箭、徽袋、鞍辔、甲冑、刀剑等,共4000多件,最早者为清太宗时期所用,此外为康熙十年至光绪元年历次送至从世祖(顺治)至穆宗(同治)朝诸帝遗物。此项藏品原为零星入储,至乾隆初次东巡的次年(乾隆九年),传旨武备院,从太宗、世祖、圣祖、世宗及他本人所用武备中挑选2600余件,集中运至盛京收藏,奠定了此项藏品的基础规模。此后按照制度,于前代皇帝去世后,由其遗物中选择一部分派人运送至此,或于皇帝东巡时随驾带往盛京。所藏多为各种箭枝,较珍贵者是数十副镀金嵌珠等装饰的御用鞍辔,分别置于按“和、风、甘、雨、露、景、星、庆、云、霞”编序的10顶大柜中。由于满族人有擅长骑射的传统,历代皇帝又以清朝武功定天下为标榜,所以皇帝东巡至盛京时,往往亲自登楼阅视这些先帝遗物,察看保管情况,以示珍视和敬重。

飞龙阁下层的主要藏品,是乾隆四十七年奉旨从北京运来的一批古代青铜器。包括商、周、汉、唐、宋历朝所制鼎、彝、盂、盘、卣、爵、觚、钟等共八百件,按编号存放于13座大柜中。乾隆晚年著录宫内所藏古铜器时,将北京宫苑所贮编为《西清古鉴》,而将盛京的这批古铜器集中编入《西清续鉴·乙编》,成为清宫收藏古代文物的一个特殊专项。

2. 翔凤阁

位于中路崇政殿西侧,建造时间及样式同飞龙阁,阁内所存主要供皇帝东巡期间陈设使用和赏赐臣下之用,多是乾隆时由北京宫中调运至此,大多属清代宫中所用工艺美术品和书画。大致可以分作为三部分:一是供各宫殿内陈设的御用器物,包括玉器、瓷器、漆器、珐琅器、金银器、竹木牙角雕刻、文房四宝等,连同备用品在内共两千多件,都是专为宫廷制造的御用之物,属清代工艺美术品中质量上乘者;二是备皇帝至盛京时穿用和赏赐的服饰、衣料、荷包等,共四千余件,均为清代江南三织造(南京、杭州、苏州)专为宫廷使用制作的;三是供皇帝驻蹕期间查阅和欣赏的书籍、舆图、书画等近千件,其中唐、五代、宋、元、明、清历代画家和清代皇帝作品300余件,或备皇帝在此期间欣赏或为宫殿装饰之用,是清宫所藏古代书画的重要组成部分。

3. 东七间楼

位于飞龙阁之后，建于清太宗时期。面宽七间，上下两层。原用作存放皇帝卤簿仪仗和乐器之用，俗称銮驾音乐楼。后内存銮驾迁至大政殿后新库，此楼改为存放瓷器等项物品。乾隆四十四年，因北京宫殿瓷器库存过多，而且品种比较单调，需加调整，皇帝命分别移送热河行宫和盛京故宫各 10 万件。本年六月，这批瓷器到达沈阳后，便存放在东七间楼中，直至清末。从那时起此楼也被称为“瓷器库”。根据档案记载，此次运来盛京大多为景德镇烧制的清代官窑瓷，其中康熙朝的 35000 件，雍正朝 25000 件，乾隆朝 40000 件。此外，楼内尚有一些乾隆以后陆续由北京运至的瓷器，共 4000 多件，包括明、清两代官窑制品，其种类和质量都要优于前项大宗者。

4. 西七间楼

位于翔凤阁后，建筑年代和样式与东七间楼略同，清代乾隆以后也称为“书籍墨刻楼”或“档子房”。据此可知用途主要有两项：下层是盛京内务府存放档案之处，民国时统计，共存有满、汉文档案 60000 件（册）。上层为存放书籍墨刻之处。根据乾隆年间的规定，北京宫殿武英殿修书处新刻的内府图书（俗称“殿版”），必须送一部或数部至盛京收藏，至清末，楼内有这类书籍近 500 种、1100 多部、15000 多册。“墨刻”，则多是历代书法名家书迹或清代皇帝御笔诗文的刻拓本，也是由清宫造办处精于此技者按照皇帝的旨意精心加工而成，虽非墨书原迹，但刊刻拓印均精美，系出于欣赏或装饰目的而专门制作供宫内使用，有的装裱成册，有的装裱成卷轴，所以也具有相当高的艺术价值，与前述“殿版”书籍一并保存。

5. 凤凰楼

位于崇政殿后内廷区域南侧正中，共三层，清太宗时期建，底层为进出寝宫区通道，中、上两层从乾隆年间起用于收藏宫内重要文物。主要有以下三项：一是《实录》。乾隆八年皇帝为尊崇盛京开国宫殿的地位，命将太祖至世宗（雍正）五朝满、汉文《实录》，各缮写一部送往盛京尊藏，即放于凤凰楼上、中层共 30 顶大柜之中，至乾隆四十三年移至崇谟阁。二是“圣容”和“行乐图”，即皇帝画像。亦为乾隆时期奉旨送至，其中身着朝服于宝座上端坐者称为“圣容”，而读书抚琴、骑马射猎等带有生活意味者称“行乐图”。至光绪年间楼内共有太祖至穆宗（同治）历朝皇帝圣容各一份，乾隆、嘉庆、道光行乐图共 13 份，都精心收贮在特制的大画箱中。这些皇帝像均出自内廷画家之手，绘制工细传神，是当时纪实性绘画中的精品。三是清初御玺，为皇太极至康熙各朝皇帝所用者。原收藏于北京皇宫交泰殿，乾隆十一年（1746 年）奉旨移往盛京凤凰楼，共有“大清受命之宝”等 10 颗，多数为玉制。乾隆曾亲撰《御制宝谱记》述将这批御玺移藏盛京的原委。这些皇帝画像和御玺，都属于清宫中最具历史价值的文物，其政治意义远胜于飞龙、翔凤阁中的古董珍玩。